

严复文选

【注释本】



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
但身为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此世运转变之时
必宜人人思所以救此社会使进于明盛而无陷于阽危
则真今世之中国人所人人共负之责任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严复文选

【注释本】

牛仰山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复文选/牛仰山选注.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6-4530-7

I. 严… II. 牛… III. 严复(1853~1921)—文
集 IV. B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520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54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3.00 元

前 言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

严复从事翻译并跻身文坛,是经过一番艰难曲折的磨炼的。他幼受私塾教育,奠下扎实的古文基础。1866年因写了一篇文理通顺的古文,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接受英语、理化等新学知识。1877年又被派赴英国留学,先后在抱士穆德大学、格林尼次海军大学继续深造英语及海军知识,还在课馀阅读了达尔文、赫胥黎、孟德斯鸠等英、法著名学者的著作,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与此同时,他还根据自己对西学知识和西方著名科学家的了解,写了《牛顿传》、《论法》、《与人书》,送请当时清政府驻英、法使臣曾纪泽(曾国藩长子)审阅。曾纪泽阅后,虽觉其文有“狂傲矜张之气”,“于中华文字未尽通顺”(《出使英法日记》)的毛病,但却看出严复“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同上)。曾纪泽指出其缺点以“戒励之”,乃是“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同上)。严复留学期间知识结构、思想意识的变化,曾纪泽

对严复之文所作的评语,意味着一个既懂英语、又掌握西学知识、又能写文章的一代新型人才正在成长。

归国后,他先后执教于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但因受他人掣肘,无法施展才能。而1895年发生的甲午中日之战中国的惨败,又使他深受刺激,自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刊布《直报》”(《与梁启超书》)。决心以笔代舌,来唤起民族的觉醒,挽救国家危亡。两年后,他与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发表政论,宣传变法维新,和梁启超在上海主编的《时务报》互相呼应,对推动戊戌维新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在这个时候,他译述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以物竞天择与进化不已的观点,号召人们奋发图强,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辗转于京、津、沪、皖等地,既执教讲学,又专心译述,并首次明确提出“信、达、雅”的翻译理论,开创了中国翻译史上的新纪元,他亦被人誉为译界泰斗。辛亥革命后,他倡导尊孔读经,主张恢复帝制,又诋毁“五四”新文化运动,变得保守倒退。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它既肯定一个人的成就,也不掩饰其缺点。综观他的一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只是他人生乐章中的序曲与和声,从事翻译与撰写文章,藉以开通民智、变法自强,才是他的主旋律,他的名字也因此而铭刻在中国近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碑墙上。

二

严复所具有的新颖而独特的思想,闪烁着理性的光芒与哲学的沉思,在当时曾激起强烈的反响,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着

重要的借鉴意义。

严复的主要思想首先表现在反对外来侵略,坚决主张抗战。这在清政府腐败无能与投降主义者竞相卖国求荣的历史时代,确实是一种最可宝贵的思想。当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他举笔强烈谴责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强盗之行”,揭露其侵华的阴谋是企图实现蓄谋已久的“兴亚以拒欧”(《原强续篇》)的目的。以“强盗之行”侵夺我领土的并非日本一家,德国借故突然袭击山东胶州,也是一种强盗行为。德国的这种野蛮强盗行径理应受到主持公正的国际舆论的谴责。但英国《泰晤士报》却赞许“德与中国交涉所用之权力”(《驳英〈泰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并鼓动英政府仿效德国向我采取类似的侵略政策。视此情形,严复写道:“嗟乎!向从欧美两洲人士游,莫不言地球开化之国,英为首称,而《泰晤士报》馆又为其一时名士大夫所会合。今此论也出,则英之国民,其亦犹有野蛮生蕃之性也欤!”(同上)这就揭穿了英国蒙在头上的那块“开化之国”的面纱,露出其侵略的本质,给了它有力的一击,维护了中国的尊严。

令人气愤的是,面对敌人向我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挑衅侵扰,清政府却贪图苟安,屈膝投降。当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之时,严复痛斥“和约”背离民心,“贻误天下”(《原强续篇》),导致战事“遂不可复振”(同上)。他如此义正辞严地指责《马关条约》出卖民族利益,这在当时李鸿章(《马关条约》的签订者)正受清政府重用的时候,如果没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魄与胆量,是难以做到的。

更重要的是,严复始终坚持抗战。他说:“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同上)。因为力主抗战,对驻守山东胶州的武官

不作抵抗、拱手让地的无耻行为，在《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一文中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对驻守胶州的文官的怯懦行为，在《论胶州知州某君》一文中，也给予了毫不容情的指责。严复的这种思想是当时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在甲午战争前后国家处于岌岌可危的岁月中，无疑是时代的号角，震撼神州大地，对激励人民救亡图存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批判封建专制与倡导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是严复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的君权神授观念，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谁都不敢冒犯。即使是忍受不了君主的暴虐而起义反抗的农民领袖，当他们把昏君拉下台后，也没有忘记拥戴“明主”来治理国家。历代思想进步的文人，在他们的文章里虽然对专制统治下的种种弊端时有微辞，但在君主制严酷的统治下，只能隐晦曲折地表示不满，不敢明说与畅言。而严复在他的文章里却将笔锋公开地指向君主专制体制，他在《原强》里说：“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这种主奴关系的尖锐对立，势必造成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残酷现实。因此，他在《辟韩》一文中指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在“窃国大盗”的淫威统治下，人民只有“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的义务，却没有任何权利。如是，人民则“必弱而愚之”，国家也必然衰微腐败。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反动本质，指出了封建专制的危害。由于《原强》及《辟韩》所表达的反封建专制思想符合时代的思潮，梁启超遂致函严复，准备在《时务报》上转载。《时务报》转载《辟韩》之后，谭嗣同甚为赞赏，可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却竭力诋毁。赞赏与诋毁俱来，正是严复文章反封建专制所起的作用的真实反映。

然而,严复没有停留在对封建专制的批判上,他在揭露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竭力倡导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一是“设议院于京师”(《原强》),实行议会制;二是“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同上),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推行这种制度,“王侯将相”是“通国之公仆”(《辟韩》),而“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同上)。这和封建君主专制相比,显然是一种进步。所以,他指出:“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原强》),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实行民主政治,就可促进“民之忠爱”、“教化之兴”、“地利之尽”、“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同上)等利国利民事业的不断发展。因而,很受时人的称赞。蔡元培在总结中国五十年来哲学思想发展的得失时指出,严复文章里反对封建专制与倡导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思想,是“尊民叛君”(《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表现,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然,从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考察,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始于严复。魏源对美国“议事诉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海国图志》),曾表示过羡慕与憧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指出,单纯以西方经济建设为模式,大兴“铁舰”和“铁路”而不推行其民主政治,到头来,经济上的繁荣也只是暂时的,不能持久的。魏源与郑观应的思想开启了近代追求民主政治的先河。严复散文里的民主思想既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又有所开拓,具有进步的社会、历史意义。

抨击封建科举取士与呼唤科学,在严复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严复文章思想内涵的中心点就是开启民智。所谓开启民智,就是“愈愚”。他以为封建科举取士是造成中国人愚昧落后的重要因素。因为这种制度的实行产生了三大害处,那就

是“锢智慧”、“坏心术”与“滋游手”。这三害中只要有一害，“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救亡决论》）他振臂高呼：“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矣！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同上）揭露批判科举考试与八股取士的弊端，就是为倡导科学扫清障碍。

科学，经过实践检验而确定的真正知识，是学术命脉之所在。他说：“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同上）就是说，科学的原理与法则，都是经过反复实验证明了的，不是主观臆造的，也不是上天恩赐的。明乎此，人们才会从思想上自觉地摒弃中国传统哲学中“师心自用”、“强物就我”的主观唯心论，厌弃脱离实际与空洞无物的八股词章，学习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知识，从根本上摆脱愚昧无知，开启民智，增进民德与增强民力。

但是，近代人宣传科学始于魏源。他认为学科学是为了“夺造化、通神明”（《海国图志·筹海篇》），必须“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同上）。稍后，冯桂芬认真考察了西方国家的学术后指出，西学中的宗教经典，“皆猥鄙不足道”（《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只有算术、光学、化学、农业机械及制造技艺等才符合“格致之理”，且“多为中人所不及”（同上），应向他们学习。随后，郑观应在《易言》及《南游日记》里多次谈到向西方国家学习制造器械、修筑铁路、架设电线等专门工程技术，也属于科学的范畴。严复的科学思想与前人的思想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只不过比魏源等人的论述更详尽而已。严复的科学思想和他的民主思想一样，为五四时期高举科学与民主旗帜向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挑战起了先导作用。时至今日，也仍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三

严复文章之所以具有震撼性和穿透力，固然取决于它深邃的思想，同时也取决于它的文采。没有文采的文章，无论其思想如何深刻，也不能产生动人的艺术效果。但是，由于散文的特点所决定，它既是“载道”的，也是抒发性情的，一定程度上和抒情诗之类的作品有相似和相同之处。所以，不管它是描写客观事物或评论客观事物，都要倾注作家的真情实感，以作家对客观事物所产生的爱憎情感来感染读者。换句话说，散文里的情感因素，都是作家主观世界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严复的文章也是如此。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受人欺凌宰割的危亡局面，促使严复“心摇意郁”，忧愤难耐，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他执笔落墨，在首篇文章的开端，按捺不住内心的忧虑焦急，迸发出震人心弦的惊讶与感叹：“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论世变之亟》）这种惊讶与感叹不是虚张声势借以吓人，而是甲午战争使中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作者由此而产生的忧国忧民情绪的自然流露。当时的中国处于怎样的危亡境地呢？严复怀着沉痛的心情写道：“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燬矣。”（《原强》）在这里，且不说作者运用对比手法来叙述战争的演变是如何的简明扼要、一目了然，也不论作者运用排比手法使文章气势流畅，单说其在概述战争演变中反映出来的国土沦丧的惨败景象，恰恰是作者难以平静的忧愤情绪的真实表露。战争的失利，

已令人忧心如焚，痛苦难忍，而举国“四海晏然”（同上）的麻木不仁与不思振作，更使作者悲愤到极点。因此，他噙着眼泪写道：“然而事既如此矣，则吾岂能塞耳涂目，而不为吾同胞者垂涕泣而一指其实也哉！”（同上）忧愤之情发展到痛哭流涕的地步，并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要公开揭示国家危亡的原因，这是何等高尚而纯洁的爱国情怀！读者怎能不为这种真挚的感情所感动呢？中国危亡的实情是什么呢？君主专制的残酷压迫与剥削，致使民不聊生，国家怎么能不衰弱？因此，他怀着对封建君主专制嫉恶如仇的感情，揭露了它们“腹我以生，出令令我，责所出而诛我”（《辟韩》）的严酷统治。顽固派排斥西学与阻挠变法，又致使国家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国家怎么能不落后呢？因此，他先以“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论世变之亟》）讽刺了顽固派鼠目寸光的短视思想，表示了对他们无比愤怒的情绪。继而假借他们的口吻，再次讥讽他们道：“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同上）这就勾画出顽固派恪守祖宗成法与保守落后的精神状态，表示出对他们强烈的不满。然而，作者深知“北洋之糜烂，皆可于‘和’之一字推其原”（《原强续篇》），更不能容忍。所以，用“糜烂”形容其腐败，用“和”字揭露他们的贪生怕死，这就从根本上戳穿了北洋水师外强中干纸老虎的本质，也给了这支水兵的创办者与经营者以有力的一击，表现了作者从少年时代养成的“极喜议论时事”，“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与侯毅书》）的个性特征，充分表达了严复伤时忧国的真诚感情。正是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心，他大声疾呼抗战到底。他说：“仆生平固最不喜欢战争者也，……迫不得已战矣，则计无复之，唯有与战相终始，

万万不可求和，……”(《原强续篇》)作者如此激昂慷慨地陈述自己毫不动摇的抗敌决心，倾诉自己与民族存亡息息相连的赤子之情，已向世人表明，作者撰文反映和干预客观现实的时候，已把自己置身其中，无形中映衬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无私无惧的精神风貌和坚强刚毅的性格，做到了主观情志与客观现实的和谐统一。这种主观情志与客观现实的融合在文章里表现越明显越强烈，越能反映出作者的真实情感，文章的震撼性和穿透力也就越强。例如，他列举事实批判了孔孟以至程朱之学的“无用”与“无实”之后，以热情的语言畅论了实行民主与提倡科学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并深切地表示他的这种思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救亡决论》)，可见，他对科学与民主是多么的向往，又是充满了怎样炽热的感情！有人说，读严复针砭时弊、推崇西学与倡导改革的政论，并不感到枯燥乏味，就因为他 在议理论政时，笔锋带有爱憎分明的情感，以情感的力量感动了读者。

采用比喻、对比、对偶等手法，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也是严复散文在文采上的一个特色。

刘勰说以比喻来“切类以指事”或“写物以附意”(《文心雕龙·比兴》)，会使文章鲜明生动。严复为文，无论用比喻“指事”或“附意”，都能做到“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同上)的境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他为了从根本上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对人才的压制与摧残，从而否定这种制度，便说：“吾顿八紘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暴腮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论世变之亟》)以“网”喻科举制度对人才的网罗，以“鱼”喻参与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指出在这种制度下，即使有极少数有才能却未考中的人，也如同大鱼被搁浅

在乱石滩上一样,变得颜枯发白,“暴鳃断鳍”,老而无用。这就把一个极其严重的扼杀人才的社会制度问题,以贴切的比喻形象地反映出来了。又如,他为了表示对敌人侵略国土的无比愤怒,痛斥守土军官的怯懦行为,在《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一文中说,他获悉这个情况后,“始而讶,继而悲。讶者何?讶德人久称开化之国,而行事类盗贼野蛮也;悲者何?悲章之憊懦畏死,而致外人视之如犬彘也”。把德军无理侵夺山东胶州喻之为“盗贼”,把镇守胶州的章高元在敌人面前的表现形容为“憊懦畏死”,被外人视为“犬彘”,不仅以他们行为本身的特征描摹出他们形同“盗贼”与“犬彘”的形象,揭露了他们丑恶的灵魂,更体现出作者以比喻“索物以托情”(李仲蒙语)所产生的情感动人力量。至于在《原强》中以砖的方正坚硬可把墙砌得平正坚固作比,说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在《救亡决论》中,用豕身“群虱总总,处其奎蹄曲隈”作比,一针见血地指出科举取士为国家养成许多没有实际本领的寄生虫,等等如此生动形象的语句,在严复的笔下可以说不胜枚举。这就使他的文章在描绘事物的形象与敷陈事物的道理上变得多姿多彩,达到“喻巧而理至”的艺术境地,给人一种艺术的联想,其感人之力就成为自然之势了。

以对比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使其色彩更为鲜明,这是中国古代文章家惯用的一种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无限广阔的背景中,把客观事物的差异与主观观念的不同连接起来,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对比句包涵的意义影响人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中引起思考与共鸣。为使读者了解西学、学习西学,以西学改革中国,在《论世变之亟》里,严复首先以“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作比,“中之人以一

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循环论),西之人以日进无疆(进化论),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强调指出中、西两种思想和社会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接着又以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西人“隆民”。这种反差如此巨大而又极为鲜明的对比,说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伦理道德、选拔人才等思想观念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反映出在世界充满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这个民族是仿效西方国家不断改革进步,还是停止不前为时代所淘汰,从而启发人们从中、西截然不同的比较中,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由此可知,对比本身虽然没有更多的艺术形象性,却从不同事理的鲜明对比中,使文章产生了巨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以对偶句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它和对比一样,既可以句式含蕴的意义牵动读者的心灵,又可从偶句语言发出的声音扣动读者的情愫。严复抓住偶句的特点,在他的文章里,调动自如,运用灵活,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变化自然。例如,他为了使人们懂得,如不发愤图强,自立自强,而被人奴役,将会出现这样悲惨的局面:“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休;以战则我常居先,出令则我常居后。”(《原强》)以君臣相比,说明地位不同;以雄雌相比,说明强弱不同;以耕劳与食休相比,说明劳逸不同;以战居先与出令居后相比,说明权利与义务不同。如此相比,虽然与“言对为美,贵在精巧”(《文心雕龙·丽辞》)尚有一定距离,却符合“事对所先,务在允当”(同上)的原则,而词语中生发出的音节的美,字字在扣动着读者的心扉。又如,他为了表达坚决抗战的思想,挥笔写道:“愿诸公绝‘望和’之一念,同德商力,亟唯军实之求。

兵虽乌合，战则可以日精；将虽愚怯，战则日来智勇；器虽苦窳，战则日出坚良。”这种词语上兵与将相对、愚怯与智勇相对、苦窳与坚良相对，匹配相当，并不是“双比空辞”（刘勰语），是实际生活中事不孤立的反映。而且，骈四俪六句式的整齐排列，读起来声调铿锵，抑扬顿挫，它不仅传达出一种坚强的、昂扬的、奋发前进的雄伟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又能够使文章产生一种阳刚之气，而且艺术上还能给读者一种美感与快感，真是妙不可言。

创造人物形象与刻画人物性格虽不是严复的文章最为突出的特点，但他在几篇传记体散文中，却描绘出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独具特色的思想性格，产生了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

《道学外传》里的村学究，这是作者以冷嘲热讽的笔法，从描写容貌形体到揭示内心活动而创造出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物形象。这个人“面戴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颌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抓住了人物的几个典型特征，以传统的白描手法不加修饰地勾画出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形象，展示了他内心深处的思想活动，从而为进一步深入地刻画他的思想性格埋下了伏笔。

这个村学究究竟是个具有什么样思想意识的人物呢？作者又是怎样来写他的思想的呢？作为传记，作者除按照传主的形貌特征，以寥寥数语交代了他屋里的笔砚书籍，使之与村学究的身份形成自然的谐调外，主要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展开了对村学究思想性格的刻画。作者写道，这个人从六七岁开始读圣贤经传，直到五六十岁，从未中断。他为什么如此皓首穷经？就因为“国家之功令在是也”。也就是说，读书人只有通过科举考

试,才能步入仕宦之途,获得功名富贵。村学究不但自己坚定不移地走科举仕宦之路,而且要把这种风气传给子孙后代。由于他坚信科举仕宦是使读书人飞黄腾达的正确途径,所以他认为废除科举考试就意味着国家的灭亡。这就相当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思想的影响和毒害是多么严重,也反映出像村学究这样的人的思想是何等愚蠢。因为他的思想愚顽不化,对二十世纪以来掀起的社会变革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认为报纸宣传反抗外敌是庸人自扰,报纸鼓吹民主是违背祖宗遗训。这样,一个“生为能语之马牛,死作后人之殭石”的村学究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廉夫人吴芝瑛传》里的吴芝瑛,是作者竭尽笔墨之能事来肯定和赞扬的女性形象。作者写她慷慨解囊以济人危困、集资兴学培育一代人才、营葬秋瑾遗骸以示对朋友的钦敬和友情,都反映出她助人为乐、公而忘私、仗义勇为的崇高品质。尤其是她营葬秋瑾受到弹劾,毅然带病离开德国医院时,作者写道:“当此之时,夫人方病咯血,卧上海德国医院中为治疗。闻此,乃遽归其家曰:‘吾不愿更居洋场医院间,若托异族保护然,以为不知者诟议也。’”这个细节叙述简明,朴实无华,没有任何渲染与夸张,但却写得声口宛然,逼真动人。而吴芝瑛胸怀坦白、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思想品质与崇高的民族气节,也得到更为鲜明的突现和进一步的强化。

严复散文的文采还不止于此。诸如,在《原强》与《救亡决论》中,以问答方式展开论述,连接文章的组织结构,使其转换自然,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在《蒙养镜序》中,写某些上层人物的内心活动,也颇细腻逼真;在许多文章里掺进外国的词语,既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新鲜感,又为中国的语言增添了

新鲜血液,大大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都值得重视。

其上所述,很可能并没有将严复文章的主要思想和艺术成就概括尽净,只涉及到几个主要方面。严复的文章所以有上述的特点,当时激烈变革的社会现实对他的刺激自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学识上“能熔中西为一冶”(吴汝纶《致严复书(三)》),才使得他能够以物竞天择、进化不已的观点呼唤民主、科学,倡导变法自强;又因其“兼能文章”,有“子云笔札之功”(吴汝纶《致严复书(一)》),也才能使他的文章具有着鲜活动人的文采。